

法国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La Collection de l'histoir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法国人文古迹

LES COMÉMORATIONS DE LA FRANCE

主编 张平 黄传根

FRANCE

法国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La Collection de l'histoir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法国人文古迹

Les Comémorations de la France

总主编：户思社

主 编：张 平 黄传根

编 委：户思社 张 平

王长明 黄传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人文古迹/张平,黄传根主编.—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10.12

(法国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100-2632-4

I. ①人… II. ①张…②黄 III. ①法语-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②名胜古迹-简介-法国 IV. ①H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0172号

法国人文古迹

主 编 张 平 黄传根

责任编辑 李林海 门莉君

视觉设计 飞洋设计机构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85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87232980(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交大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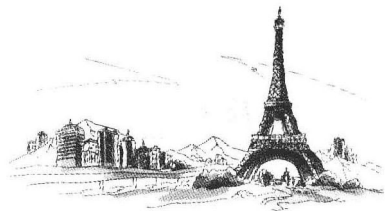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2632-4

定 价 22.5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前言

由于教学工作，尤其是文化教学和法国文学教学的缘故，经常遇到一些人文方面的知识问题，给备课和教学带来了不大不小的困难，即使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多方查阅，因为种种原因，也是挂一漏万，留下颇多的遗憾。于是我们在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扩充，并参考新老研究成果，修改完善，最后整理成册，既可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也可作为有意了解法国人文知识者的参考资料。当然其中涉及的人文知识不是很全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研究的是个别情况。

为什么要研究个别情况？我们觉得这些人文知识不仅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恰似记忆中的物体，器具或法规，如同化学反应之后所留下来的沉淀物，值得人们永远去记忆。这里的记忆应该从词语本身的所有含义去理解，它既包含着诸如烈士纪念馆和国家档案馆这类最物质和最具体的含义，又有诸如国界线，朝代，甚至地区和“人的记忆”这类最抽象和用最智慧的方法构建含义的概念。从早期值得记忆的地方到神圣的宪法，兰斯或先贤祠，到我们共和国童年的简单教材；从13世纪圣但尼的编年史一直到法语语言宝库；还有卢浮宫，马赛曲和拉鲁斯百科全书。

因此，值得记忆的事物就是被无数层面穿越的交叉地带。编撰历史的层面始终存在，因为它是历史的历史，值得记忆的事物是构建历史的物质基础，是其生产资料的历史，是其生产力和生产过程的历史；但同时也有人种的层面，因为它时时刻刻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熟悉的、在火热的传统中形成的习惯，要求我们绘制自己的心理地形；有心理学的层面，因为我们应该要求个人与集体相一致，应该尝试着把那些概念放进社会定义域里去：无意识，象征意义，引申意义……概念的定义既不清楚，也不确定，而且还涉及政治层面，有可能当我们把政治作为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和游戏去理解时，记忆很可能就是一种框架而非其中的内容，记忆是始终可以随时使用的赌金，是全部的谋略，是某个站在那里的人，他的价值不是通过自身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我们对他的利用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我们涉及到值得记忆的事物的文学层面，我们把兴趣最终放在了舞台艺术和历史学家自身的介入程度上。

我们不可能对如此大范围的地方逐一扫描，因为这些事物不仅仅包含着对死者



的祭祀和对不断增加的所有民族遗产，而且还包含了通过现在俯瞰过去的所有因素。因为这里我们所说的记忆与忘却并不对立，记忆包含了忘却，同时又与回忆不同，记忆意味着回忆。要想使选题绝对完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保留的选题，视觉质量高，客体挖掘深，切入问题的方法丰富多样，而且与宽泛的整体结构达到平衡。

本系列丛书分六册：法国的国家象征，法国人文古迹，法国文化教育，法国的纪念活动，法国文化遗产，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比较丰富，篇幅宏大。书中对大家耳熟能详的事物基本没有涉猎，也就是说，该系列丛书是对法兰西人文诸多方面的进一步挖掘。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主要是供法语专业学生使用，同时也适合广大文学历史爱好者参阅。我们对该系列丛书内容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是教学，所以针对性和实用性比较强，对喜欢法国人文知识的人士当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一定能满足其夙求；此外，由于时间仓促，主要还是因解燃眉之急，编写前后未对文章体例确定统一的要求，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篇幅长短不一，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各位编者的表述风格，遣词造句也不太一致，评判事物的观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者恭请读者谅解，暂且接受我们的选择。

研究如同探险，一波又一波的研究者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进，继续探索，继续补充，继续完善研究成果，继续将新的发现呈现给读者，接受读者的评判，从读者的评判中得到启发，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系列丛书实属许多学者和同仁的共同研究成果，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促进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也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参考。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学者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时代在发展，研究无穷尽。希望广大读者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使这套系列丛书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为法语教学与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 者

2010年7月



T 目录

Able des matières

001	古迹研究所
023	人文古迹的普查
039	人文古迹修复
066	国家古迹博物馆
097	外省博物馆
137	科技协会
164	世族家谱
178	皇室教堂





古迹研究所

1832年10月，当基佐担任国民教育部长时，已年过半百，显得更加成熟稳重。十五年来，他在政治上平步青云，还完成了二十年前着手撰写的一部历史学术专著的主要章节。此后，离开政界的日子，他还在不断地对这本著作进行补充。《回忆录》出版于1860年前后，又从另一角度给他带来了荣誉，使他名噪一时。

与其说他作为政治理论家，不如说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走进政府。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新闻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且也赢得反对派的尊敬。对于那些对他俯首称臣的大部分行政官员来说，同样是这种身份使他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地位。他严格区别对待政治活动与历史研究，从他走进国民教育部直至1837年御任为止，他在政治活动中总是受到指责，而在历史研究中却从未遭到过非议^[1]。同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将两者完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确实，大家都一样，不注意自身的修养，也难以发现别人的长处。

国民教育部长一职使具有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基佐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后来出任外交部长一职却未能达到如此满意的程度。在他就任部长后不久，他妻子写道：“他很高兴能当上部长，又兴致勃勃地回到过去的同伴身边，从事着青年时代的工作。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国民教育部是他感到最为满意的地方^[2]。”

基佐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力地将这个部门治理好。1832年，他可以说还没有厚实的政治功底。1828年，为了做好全职部长，他辞去了教会的任职，从1830年7月开始，他才赢得了大家的敬意。提到国民教育部，基佐的五位前任并没有比只能给大学更换校名的校长们更多的权利，而在基佐的争取下，国民教育部的职权范围得到了应有的扩展。除了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外，还包括各种各样和甚至次要的学术机构：如法兰西学院、自然科学博物馆、古文献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与著名的皇家图书馆以及核心机构法兰西研究院。总之，这就形成了一个



宽广的学术空间和一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历史研究机构，基佐即将成为这个中心的核心人物，履行自己的职责，实施自己的方法。众所周知，他既不缺少权利，也不乏好的想法。

在基佐认为具备的能力中，他承认只有雷厉风行和行事果断才是执行决策中必不可少的优点。事实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提议或创建了两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这是两个学术机构共同演变和相互发展的需要：一个是法国历史学协会，另一个是经过重新命名的历史科学研究委员会，这两个学术机构至今还存在。从这两个学术机构中都可以发现历史学家兼政治家基佐的影子：历史学协会代表着前者，委员会表现着后者。除此之外，他为了同一目的，还推行了其他计划，尽管不如前者那么重要，但是同样具有意义。总之这都是为了发掘、保存和让人们了解法国的历史资料。

无论是基佐教授还是基佐部长都不是这项计划的发明者。

档案陈列馆

无须追溯到中世纪或者更早，因为在欧洲或其他地方，历史资料本身就缺乏肯定的来源，只有到了王权开始代表国家时，即从查理五世到路易十一这段时期内，法国历史资料才有了特别的地位，因为它们既不属于公众，也不再归个人所有。此时，这些创建与维护合法性和记载民众强大活动的历史资料被收集起来并予以封存，这样的文献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史料库一词就是对其最好的说明，先是用羊皮纸，不久改用普通纸进行记载，在史料上封上火漆以体现其价值，并以此显示权利、意义、知识和传统等丰富的含义。在中世纪，人们就已经认为越古老就越有价值，有关国王和与其相关的事件都应该避免遭受岁月的侵蚀，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文字游戏中降生。

从16世纪开始，在王权扩张和制定行为规范的作用下，文献资料很快多起来，人们试图用文字形式将法规、习俗法、资产类别、判决、决定、调查等固定下来，这就造成文稿与印刷品堆积如山，并且没有进行分类和汇编，让人无法使用，但又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这些可查询的文献资料，国家就失去了效力、延续性和合法性。最先认识到文献资料重要性的富凯视国家兴亡为己任，对此深表忧虑，为了保障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行，他计划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筛选。但是，直到18世





纪下半叶，这一庞大而又重要的计划才在各个方面得以落实。

自 1759 年起，雅格布-尼古拉·莫罗开始担任“财政部的法律顾问^[3]”，这位法学家虽然只有四十五岁，还是一个资质不深的多题材作家，但他却成了一名年富力强和积极肯干的组织者。他负责财政部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而那时，财政部在结构和职能方面已经是一个最现代化的部门。他专门为部长搜集各种类型、甚至非常古老的文献资料，以此作为国王在领主要求和议会抗税面前向其征税的法律依据。1762 年，莫罗升迁为“财政部图书资料总管”，他向思想开明、自炫历史知识渊博的财政总监贝尔坦建议成立“一个历史与公共史料档案室”。第二年，就在贝尔坦担任国务委员时，他与财政部资料馆一起被并入皇家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范围内，他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复制所有 15 世纪以前起草的文字资料，并对每一份资料作出说明和归纳其核心内容。然后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清点，制定一份已出版资料的清单。此项工作后来做了，历时一百零七年，终于编撰出厚厚的八卷书籍。

莫罗提议兴建的资料馆严重缺少人力和物力。莫罗找到布雷基尼作为合作者，他是一名博学家，曾主持出版了《第三代法国国王的法令》一书，莫罗安排他主管自己筹划的清点和出版工作。除了布雷基尼、奉斯马涅和圣巴莱伊等学者外，还有圣莫尔修道院本笃会修士们也十分精通古文字学和中世纪文献，他们都是马必永和蒙弗宫的继承者，曾经对原始史料进行过严格的考证，更新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并且提出了现代治学的基本原则。他们只有六到八人，妥善保管这笔文化遗产，文献资料馆也期待着他们的合作。由于他们都是神职人员，因此，在此不必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而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古文字学家”与国家档案馆相互之间的合作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基佐的创举恰巧与莫罗、布雷基尼和莫尔会教士们的计划不谋而合，并且受到贝尔坦以及国王的支持与庇护。

相反，虽然此项计划十分宏伟，然而创建文献馆的目的却只局限在提供历史信息范围，而不是探询文物古迹的历史渊源，只能将其作为一种政府获得有效行为的工具，不言而喻，更不会将这些宝藏对公众开放。法学家莫罗认为历史是法律起源的基础，了解历史就是在创建法律和使法律合法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在缔造王朝的法律。1781 年 3 月 3 日，国王颁布诏书，将财政部图书馆与文献馆合二为一，归并法国掌玺大臣公署即司法部管辖，并为这个新机构起了一个标新立异的名称：“立法、历史与公法文献馆和图书馆”。众所周知，在这些年里，不少贵族



怀着重振家业的共同愿望，雇用了一些类似莫罗之流的封建法学家，为他们整理家书，光耀家史，发现扎根在中世纪时代的家族背景和各类权益保障。这种以法律为基础的文献发掘工作必将引发人们对历史产生兴趣，但不再是这个世纪上半叶所表现的那种哲理式或仅仅是叙述式的历史，它只会引人发思，墨守成规，甚至循规蹈矩，而是要考虑到履行权利及创建权利的体制和社会团体间的关系，要在领主及法国范围的已定空间内，充分发挥这些文献资产的作用。从这时起，大家都明白了以保护原有地位为目的的文献史料发掘工作就要求对文字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在中世纪完成的绝大部分工作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萌芽和雏形。

在旧制度末期，封建领主出于控制新法的需要，开始收集、整理和查询私人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弥漫着浓厚的回忆，再次将法国历史推移到久远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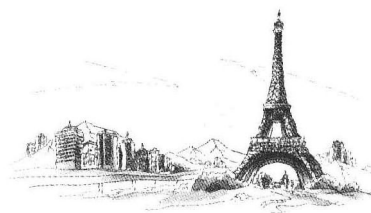
在革命运动的筹划者看来，作为法律依据的文献史料有着一定的重要性，无论是出于本能或有意将其销毁，还是从有关人手中掠夺或将其让与他人，都必将落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手中，拥有文献史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生存条件。公国、领地或皇室的文献史料一律归国家所有，并且改变了用途，以往的统治工具演变成表明集体立场的喉舌：历史不再是某些个人的事情，已成为大家的遗产。正因为如此，国民议会文献资料率先成为国家文献史料，共和国二年穠月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提议将历史资料与行政资料区分开来。我们在此颇感兴趣的是前者，并且根据是否与封建专制有关而进行着筛选，为了确定其自身的道德范围，就值得对民族回忆进行一番净化。与此同时，这些文献史料开始向公众开放，人人都可查阅，在这场使民众回顾历史的运动中，所有法国人都能够了解创建自身历史的文献史料，公民意识也在这种知识的自由传播中获取了养分。最后，在共和国五年雾月5日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将所有文献史料集中到省会城市。

尽管莫罗倡导的事业一时被中断，但由于清点与出版工作时逢更加成熟的时代，再经过筹划以及观念更新，一旦希望演变成现实需要时，必将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条件。

革命运动周而复始

在帝国与复辟时期，旧制度和大革命的遗产主要由研究院托管，而没有能够为





政府机构所用。这是因为王室或国家图书馆，以及档案馆也只归内政部管辖。然而，众人拾柴火焰高，文献馆的老研究员都是莫罗的合作者，他们被招聘到研究院任职，并且带来了考古学家严谨治学的传统和通过文献发掘工作创建民族历史的想法。在研究院里，多奴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此外，他从1808年开始担任国家档案馆馆长一职，并将18世纪观念学家收集整理的哲学与传统的历史科学联系在一起，还是他在1795年致国民公会的重要报告中，就提议筹建研究院这个“国家学术殿堂”的计划。1818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历史学与伦理学教授。多奴充满旧时代国民公会革命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他身上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与研究精神的完美结合根本上是受到了基佐文化思想的重要影响，他与基佐是挚友，甚至可以说还是罗瓦耶·高拉尔的门徒，后者从1811年起担任索邦大学的哲学与历史学教授，与多奴关系十分密切。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之间，在民族历史的重建中，在现存遗迹的清点中，尤其在旧制度传统与大革命精神的综述中，研究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一个人能像基佐那样重视研究院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是部长享有监督权，而且还因为他从1832年起活跃在他不久前组建的道德科学院，多奴成为这家科学院的负责人之一。他还于1833年和1836年分别成为文学与碑文学院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像他这样身兼数职的情况尚属罕见。

在帝国时期，研究院显得死气沉沉，这是因为向外扩张的法国顾不上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特别是对近代史进行思考，越是大革命的组织者销声匿迹或逃亡国外，这种现象就越严重，直到复辟时期，研究院才恢复了元气。1818年底，为了编写民族历史和收集足够的素材，在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领域的著名人士拉博尔德伯爵的倡导下，文学与碑文学院起草了一份关于法国“古建筑与古遗址”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法国的缺憾，就是一直没有给予这笔财富应有的重视，没有加以保护，没有在教育 and 民族历史方面充分地加以利用。”拉博尔德十分看好的这份清查法国古遗迹的计划始终没有获得结果，后来，基佐将其付诸实施。而另一项出自同一想法的计划却有着不同的命运。1820年，国家参议员与碑文学院会员热朗多男爵向内政部长西麦翁伯爵建议成立一所向学生传授解读古文手稿知识的学校，因为一直由本笃会修士与国家档案馆研究员把持的这一学科正在逐渐地消亡。热朗多早在1806年就做过类似的尝试，在他的启发下，西麦翁给国王致信到：“与国家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法国文学分支即将告别携手共进的合作伙伴，这可是一个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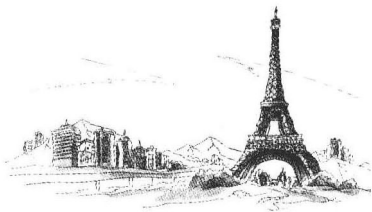


或缺的部分。”因此，国王于1821年2月22日颁布了成立古文献学院的命令，以此“振兴维护法国荣耀必不可少的学科门类”。古文献学院在经过了一段默默无闻的时光之后，由于基佐的努力获得了新的生机^[4]。

历史之需要

法国经过几十年的内乱，显得支离破碎，摇摇欲坠，又败给了以普鲁士为首的联盟军。普鲁士正处于上升势头，它代表着重新振作的德意志精神，尤其在历史和哲学研究方面有着突出表现。法国也必须恢复自信，而现实状况却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只有从历史中探究原因，才能够如愿以偿。从帝国末期到共和国的出现，所有法国人都普遍认为，创建和复兴民族历史是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迫切需要。无论在默默无闻的人群里，还是在能言善辩的名流中，这一想法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就有纪龙德极端保皇派议员杜阿梅尔伯爵，他在1827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中讲到：“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接受法国式的教育，而我们的学校却未能如此。目前所教授的罗马、斯巴达以及其他英雄与传奇时代都不利于缔造人的灵魂，而只有从法国文献与年鉴中提取的事例才更有利于培育法国人的心灵^[5]。”事实如此，作为专业教师传授的历史课程是于1818年才正式进入到大学的课堂中，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古典时代的历史。然而，对历史的呼唤首先是对民族历史的期盼，是要求每个法国人树立民族的意识，这种要求既迫切又意义重大。夏多布里昂在自己编写并于1831年出版的《历史性演讲或研究》一书醒世与犀利的前言中，简述了前几十年间热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激情，并证实到：“我们生活的年代完全成为回顾历史的岁月，并给各项工作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大家翻译历史年鉴，出版古老文稿。今天，所有文学作品都在反映历史，如论文、戏剧、小说、诗歌等。”在这场捍卫历史的运动中，许多人都需要阐明自我工作的重要性，而同时证实到法国缺少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书籍。以创建法国完整历史的伟大变革者之一基佐为代表的新兴历史学派从1810年起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夏多布里昂看来，这将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历史研究队伍，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尽快地编撰出法国通史，而对这套书籍的需求显得相当的迫切。奥古斯坦·梯叶里对“缺乏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6]”深表遗憾，尽管亨利·马丁于1833年发表了《法兰西历史》的第一卷，他也表示“法国缺少一





部完整的民族历史。”

这是因为构成法国历史的法兰西民族和法国人属于崭新的研究课题，仍处在形成阶段。人们已经不再以旧制度历史文献编撰方式研究国王与君主统治，反而转向一直被忽视的民族，即于 1789 年出现的法兰西民族，并探究其起源和描述其演变。具体来说，历史上的政治事件构成史学研究中又一新的素材，其研究材料、方法以及目的都在发生着变化^[7]。决定奥古斯坦·梯叶里投身史学研究的事业不仅来自法兰克民族史诗震撼人心的影响，还包括“使法律观念战胜一切的强烈信念”，为此，从 1817 年开始，他“在历史书籍中到处寻找支持他个人政治信念的证据与论据^[8]”。西斯蒙蒂对“历史文献编纂者的偏见”深恶痛绝，并宣布要以自己收集的历史素材重新编写历史，1821 年，他第一个大胆地将自己的历史著作命名为《法国人的历史》。这部在构思上独具匠心和值得称颂的著作完全局限在反映政治事件，再当民族概念与文明概念相互交融后，新的历史学派才广泛地发展起来。从 1812 年开始，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了现代历史课，还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他认为只有在法国，民族概念才能彻底得到体现。他在《法兰西文明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缩影，人类历史又同样是文明不可或缺的素材。”然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素材。因此，史料出版工作不仅只有文献资料，还应当包括年鉴、叙事和编年史。因为这些资料不仅涉及到政治和法律，而且还描写了社会、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现状，这样才能从各个方面了解人类生存的状况。从 1819 年至 1826 年，普提托出版了共五十二卷本的《从菲力普·奥古斯特统治时期至 7 世纪初的法国历史文献全集》，布松紧随其后，于 1826 年至 1828 年发表四十六卷本的《法国民族编年史集》，这是用 13 世纪至 16 世纪的大众语编写而成的著作。这些出版活动与基佐本人的撰写工作不谋而合，他从 1823 年至 1835 年共编译出版了三十卷本的《自法国王朝创立至 13 世纪的历史文献集》。从此，历史学家拥有了参考文献，对法国古代历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也可以一饱眼福。科学的必要性与思想的忧虑感总是并驾齐驱，我们只有把时间连贯起来，把大革命事件置于连续不断的演变中，寻找能够阐明其原因的前期事变，再透过层出不穷和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表现出大革命对其存有疑惑与复辟王朝借助反向运动对其威胁的法国历史与民众的统一性，我们这样才能理解这场从前无法解释的事件。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了解近期事变的原因。基佐这一代史学家对大革命的研究，就是要从中得出一个正面的结论，以此避免发生



新的大革命。为了搞清楚发生革命的原因，就必须追根求源，以便将现实载入永恒的民族记忆之列，对其性质、确切性和道理要有先见之明。弗里耶尔、奥古斯坦·梯叶里、米涅、奎内、米什莱等人一直求大同存小异，直至 1840 年才与基佐在这些观念上达成了共识^[9]。在他们看来，无论他们是专职或业余从事的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是对了解现实具有必不可少的警世教育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而且还是为了清楚地认识自身的民族及民族利益。近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揭开了古代革命事件的新篇章，要正确评价法国的现状，就必须对其有所认识，才能最终明白法国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这次调查中，中世纪成了一个很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里，逐渐地构建起法兰西文明的框架，锤炼出政府体制与统治工具，涌现出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些力量形成了今天的民族核心。根据奥古斯坦·梯叶里的看法，“民族中占据人数最多而遭到遗忘的这部分人应该在历史中获得复生，绝不能认为生在昨天的中产阶级或人民大众就缺乏爱国主义和历史动力^[10]。”

对民族统一性基础的探索，第三等级的历史合法地位，新型历史学的需求，这些都是基佐从教授到政治家一直所关注的问题。

教授时代

在基佐及他的知识界朋友们看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由社会精英领导的政府能够在具有开创性的制度中体现时代精神并完成历史使命^[11]。在掌握政权之前，七月王朝未来的主宰者就已经利用在大学的权利，尝试操作这种开创未来的精英政府。他们是一代新人，没有参加革命运动，没有荣获帝国的荣耀，也不会背上失败的包袱，他们想方设法走进权利的中心，并在高等院校中找到了位置，以此证实自己的想法，完善自身的知识和履行应尽的职责。与沉浸在回忆中和张扬个人经历的政治阶层相比，这些人思想更开放，至少比他们坚强得多，能够面对现实社会提出的种种难题。复辟时期虽然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和管理事务之外，却给他们留下了一块能够树碑立传的空间。奥古斯坦·梯叶里写道，随着基佐、维尔曼和古森三人从 1820 年起走进课堂，“教师队伍就跃升到社会主流行列^[12]”。1822 年，维莱尔部长下令取消了他们的教学权利，却未能助长邪恶丑化道德，而使得强权向





智慧低头，抬高了教授们的威望。1828年，基佐凯旋式地重返讲台，不得不多次要求听众们保持安静。在复辟时期，基佐的政治活动主要是编写历史著作^[13]，对于他所认识和构想的现代社会来说，重新发现与整理民族史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时代的发展越具有连贯性，国家的现状就越能得到保障。基佐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对这一点做了大量的阐述，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于1828年复课的情况：“在我为现代社会努力奋斗的事业中，我真情希望能把正义和善良带到我们中间来，以此善待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习俗，缅怀勤劳勇敢的法国人经历了1500年的古老社会和汇集了由我们承继的文明奠基。假如一个民族淡忘和轻蔑历史的过去，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严重的衰退^[14]。”基佐以他在教育部的行为指南为样板，进一步强调了他一生中完美的追求：“我曾在索邦大学的课堂上描述过法兰西文明的发展史，这种引导和激励我的想法跟随我一起来到了国民教育部，使我精神振奋，情趣盎然，刻苦地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15]。”他这是在以其他方式和更大的规模实现着精英政府的奋斗目标。

越是七月王朝缺乏合法的地位，对历史的求助和对民族回忆的探索就越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复辟王朝属于变革的时代，它却自称是旧制度的延续，并以合情合理的外表，直接与最古老和最辉煌的法兰西传统相提并论。通过政变上台的七月王朝完全表现出一幅投机政府的模样，甚至连名称也显得不合时宜，既不是继承，也未通过选举，更没有教会加冕，法国人的国王在缺乏经过任何一种公认或已被接受的方式就登上了王位。而在基佐的学术与政治体制内所倡导的保守原则呼唤着迅速创建传统的做法，假如路易·菲利浦不照例行事，那他就只能依赖现实状况即民族。这个极端民族化的国王将自己裹在三色旗中，象征王权与大革命的最终结合，在经历无数次风云变幻之后，达成了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谋求的共识。七月王朝体制是千余年演变的结果，只因缺乏合法性，才不得不求助于民族历史，其中既没有对立面，还能够弥补其软弱的一面。对自己的出身中产阶级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早期的城镇在12世纪就已经与国王缔结过同盟。

这就是为什么基佐拥护的保守原则启迪他从事一项既野心勃勃又有创新意义的学术事业，并将此融入两种不同又相互紧密联系的体制中。



法国历史学会

基佐讲到：“我的几个朋友向我谈起他们想成立一个专门出版民族历史文献的协会，命名为法国历史学协会^[16]。”这种想法完全迎合了部长兼历史学家基佐的想法，并在他的促使下得以实现。总之，1833年6月27日，在皇家图书馆的收藏馆大厅里举行了成立大会，基佐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此项工程的负责人，排在这天当选的二十人委员会名单的首位。在这些委员中，有的是基佐的政治伙伴，如莫莱、梯也尔和贵族院主席巴斯克耶，有的是志同道合的历史学家，如巴朗特、米涅、博若，再有的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如弗里耶尔和维泰。后来在这份名单中又添加了一些专家与学者，如皇家图书馆手稿文献管理员尚博里翁·费雅克^[17]、皇家图书馆馆长勒特罗内、王室考古学家协会成员克拉布莱和代表二十年前德科蒙创建的著名诺曼底考古学家协会的勒维尔，该协会给予委员会极大的支持^[18]。总之，这里云集了一批共同反对复辟王朝的自由主义者即空论派、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分别来自特定的领域，基佐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阵营，并成为他们的代表。

1834年1月23日，协会在塔拉纳大街确定了协会纲领并开始工作。理事会由三十人组成，每年更换三分之一，后来又增补了十一名新成员，其中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管理员儒尔·德奴瓦耶尔^[19]，国民教育部文学与科学地区分会会长伊博里特·罗瓦耶-高拉尔，还有皇家图书馆勋章馆副馆长查理·勒诺尔曼。基佐很快就注意到了查理·勒诺尔曼，对他大加赞赏，并于1835年推举他接替自己在索邦大学的课程^[20]。弗尔提雅·杜尔邦侯爵当选为协会的名誉主席，多半凭借他的高龄（1754年出生）而非才能。普罗斯佩·德·巴朗特是基佐的政治伙伴，两人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他曾经成功撰写了《勃艮第公爵历史》一书，并主持协会事务直至1866年去世。协会成立一周年，已有一百多名会员，其中就有法国驻西维塔维齐亚的领事亨利·贝尔。

正如1834年第一期通讯中所写，协会的目标就是“通过健康的评论途径，特别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与运用，普及民族历史的研究与学习兴趣。”实际上，协会会员都在观察别人的想法，法国人也都在“等待一部自身民族真正历史的出现”，为了实现这一宿愿，协会理所当然地做出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有关法国历史的文献





集。透过已发表的每篇文章的标题，都清晰地表现出教育及思想的意图，这部文献集不是针对学者，而是写给那些非历史专业而喜欢民族历史并希望了解历史古迹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文献集套用了一种“便携”版本即八开本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对开本或数世纪前采用的四开本，更不是现代学术出版界流行的版本，特别是德国版本，如《日耳曼历史古迹》，法国历史学协会在诸多方面仿效其做法，特别是在研究历史起源方面同出一辙。千真万确，斯坦在1818年维也纳大会之后退出了活跃的政治舞台，但他一直充满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激情，保持永恒的爱国主义热情，并在此前的十年中为普鲁士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声称对历史研究颇感兴趣，他一边采用其他方式继续从事以往的政治活动，又一边组织人力整理和研究德国历史的文献史料，特别是中世纪的文字资料，以此证明德意志的存在源远流长和澄清现在的政治格局给人民造成的错觉。最后，斯坦集中了一批学者，并获得世俗界和宗教界领袖的支持，为的是让大家明白，此项计划已超越了普鲁士，成为了全德意志民族的共同事业。1819年1月20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古日耳曼文献史料研究与出版协会”，同年开始发行季刊，并花费了五年时间制定出整套出版计划。主持此项工作的专业负责人是贝尔兹，他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中世纪古文献学家，他从事这项工作直至1873年，这期间他一直锲而不舍地研究和编纂出版《日耳曼历史古迹》，前数卷书籍无疑是关于中世纪的叙述性文献史料。直至1835年，他们已经出版了三卷丛书，而这时法国历史学协会在通讯中才开始注意到同类学术著作的杰出成就。儒尔·德奴瓦耶尔对此非常关注。然而他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只是将其与在旧制度时期由本笃会负责和由研究院资助的《法国历史学家论文集》^[21]进行了一番比较。但是除了出版意图之外，其书籍的广度及学术质量与直至今日出版的类似书籍相比决无相似之处。从1831年起，与贝尔兹合作时间不长的博梅尔开始出版《萃集》系列丛书，这是一套皇家与王室文献目录集，与《日耳曼历史古迹》一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工具书。再因为《日耳曼历史古迹》丛书与渐渐失去生气的法国历史学协会截然不同，不断地向多学科方向发展，大幅度地加快了出版图书的节奏，特邀像贝尔兹的继任者瓦兹和莫森一类著名专家加盟。从1875年起，《日耳曼历史古迹》丛书编委会变成了国家级组织机构，总部设在柏林，拥有可观的资金，但从未失去科学的特性。

1834年，两家协会的出版方向开始呈现出微弱的差别。法国历史学协会在出版

